

谭延闿评传

成晓军 著

岳麓书社

序 言

谭延闿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很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的活动跨越了两个历史时代。他出身清末翰林，做过南北政府的督军、省长，当过广州、武汉和南京的国民政府的要人和主席。从学界巨子到三任湘督，由立宪派首要到国民党元老。他曾是孙中山国民革命的助手，后来又做了蒋介石独裁专政的“伴食宰相”。一生政治生涯，可谓光怪陆离。是风云变幻的近现代中国社会，赋予了他这种复杂的政治品格。由于他长期涉迹政坛和军界，晚年又卷进了历史逆流的旋涡。因此，以往对谭延闿的评判，概以军阀、官僚、政客和国民党右派定论。谭延闿成了反面的历史人物，对他的研究也就成了“禁区”。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强劲东风，给学术界捎来了春的信息，史坛对谭延闿的研究，也呈现了活力和生机，发表了多篇有见地的文章，对形而上学和“左”的定论提出了挑战。

然而，由于谭氏的历史轨迹错综复杂，加之传统偏见的消极影响尚在，故一段时间，对其活动和思想的研究，往往受成见的干扰和束缚；对其是非功过的述评，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而且时至今日，史坛还没有一本全面评述谭延闿的著作出版。

成晓军新著《谭延闿评传》的问世，填充了这一空白。作者用近十个春秋，多方收集整理资料，经过多年的呕心沥血，写成了这部近 26 万字的著作。《评传》总括了谭延闿的全部政治生涯，对其是非功过作了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是建国以来第一部系统研究谭延闿的专著。它凝聚了作者多年研究的心血，

是继作者前年面世的专著《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之后的又一部力作。

读完这部书稿,觉得有这样一些特色和优点。

其一,把人物置于一定的历史范畴,抓住社会主要的矛盾,对历史人物的思想与活动分段进行评价。《评传》认为,谭延闿是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步入政界的。这个时代的中国社会,政治上的主要矛盾和斗争,表现为共和与帝制的冲突,革命党同清王朝的对立。谭延闿登上政治舞台时,虽然还保留有封建士大夫的印痕,但他没有继续为“皇族内阁”卫道,也不再替科举制度殉葬;却热心推行新式学校教育,主张用资产阶级议会制取代封建君主制。做了立宪派的著名领袖,成为清王朝的反对派势力。

在他三次督湘期间,其基本方面,在政治上奉行反清共和路线,提倡资产阶级政治;在经济上主张开办近代实业,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南北军阀战乱期间,谭延闿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虽曾出现过妥协和反复,但反清共和的政治走向总体上没变。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革命时期,谭延闿审时度势,摆脱军阀内部角逐的纠纷,走上了追随孙中山的革命道路。他遵循中山先生的旨意,整理民国内政,统领军旅,讨逆伐叛,在政治和军事上成了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为两广的统一和根据地的创奠,做出了重要成绩。孙中山逝世后,他继续执行孙中山既定的政策,同共产党人合作,成了广州和武汉国民政府的主要领导人。

作者在研究大革命紧急阶段和南京政府建立期间谭延闿的政治表现时,注意把握时局的转换,社会主要矛盾的易位,以及阶级关系的重构,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层面,谨慎地分析他背离国民革命的主客观原因,揭示其由进步走向反动,从量

变到质变的演化过程。我认为,《评传》把谭延闿放在一定的历史环境内,考察其思想、活动对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和促进历史进步起什么样的作用,以判定其是非功过,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评传》通过大量历史材料的分析综合,认为谭延闿一生的活动,就其大部分时间和主要方面来看,应该肯定的。

其二,超脱成见,不落旧套,敢于实事求是。《评传》摈弃了军阀、官僚、政客的框架来构筑谭延闿生平事迹的思路,力求按历史人物本来的活动轨迹进行撰述。全书分十章,从章节设置到纲目构思,不从概念出发,而靠史实的升华。纲举目张,把谭延闿一生的主要活动,阶段分明,脉络清晰地勾划了出来。作者评价人物事件坚持了尊重历史事实的科学态度,其中不乏新见。如对焦达峰、陈作新被杀一案的评判,史学界都说是谭延闿为首的湖南立宪派,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的政变事件。谭延闿是靠这次政变,杀害革命派而登上都督宝座的。作者不囿于成见,通过对事变历史资料的充分考证,认为焦、陈殉难,有革命派自身的弱点;谭延闿出任都督,有其社会政治的原因和他本人的主客观条件。

总之,《评传》对谭延闿在辛亥革命时期的言行,三次督湘的政迹,大革命年代的作为,以及在南京国民政府中的过错,论人叙事,不溢美、不掩恶;不拘泥于成见,也不苛求前人。实事求是,尊重史事,力求在史实与理论的结合上写得符合情理。其间不乏作者新识。

其三,以传带评,寓论于史。《评传》在写作的指导思想和方法上,注意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同时借鉴了我国传统的“寓论于史”的写作方法。如作者评述谭延闿各个时期的思想与活动时,重视用唯物史观驾驭史实,用阶级分析方法洞察当时社会环境和政治现象,避免史事的陈述罗列,防止抽象的演绎推理。注意从材料中引出结论,透过历史现象揭示其自在的

规律。所以，从总体上看，《评传》在史论结合上是做得好的。这也体现了作者治史的功力。

其四，资料丰富，取舍精当，不枝不蔓。作者为详细占有材料，以写好《评传》，曾十度寒暑，奔走于几十家图书馆和档案馆，查阅了数以千计的报刊杂志及文献资料。仅仅谭延闿的年谱、手稿、诗文和电稿，便收集了100多万字。作者殚思竭虑，对浩繁零乱的史料去粗取精、释疑辨伪，才铸成这部新作。可见，作者的治学精神是勤奋刻苦的，治学态度是很严谨的。《评传》资料翔实，忠实可信，有不少是第一次露布的珍贵资料。

综览全书，我认为《评传》以丰富的史实，雄辩的逻辑和创新的勇气，评说了谭延闿一生的政治活动，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谭延闿不是近代军阀、官僚、政客的代表人物，而是富有爱国思想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治家。《谭延闿评传》的问世，是民国人物研究的重大突破，也是民国史研究的新成果。

范忠程

1993年3月

目 录

第一章 家世和早年生活

- 一、总督之子 (1)
- 二、科举成名 (7)

第二章 从兴学到立宪

- 一、赞助新式教育 (13)
- 二、谘议局议长 (19)
- 三、力争路矿权益 (23)
- 四、请愿与组党 (37)

第三章 第一次督湘

- 一、附和革命 (43)
- 二、继任都督 (48)
- 三、坚持反清共和的政治路线 (57)
- 四、实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 (72)
- 五、“二次革命”中扮演不光彩的角色 (103)

第四章 第二次督湘

- 一、“寓公”青、沪 (124)
- 二、重掌湘政 (129)
- 三、宏图再展 (137)
- 四、南北依违 (164)

第五章 第三次督湘

- 一、在野督军 (180)
- 二、“驱张”渔利 (188)
- 三、勉力扶持危局 (199)

四、扫兴而去	(211)
第六章 追随孙中山(上)	
一、任职大本营	(215)
二、奉命讨赵	(225)
三、南援粤北	(239)
四、整军建军	(245)
第七章 追随孙中山(下)	
一、东征陈炯明	(250)
二、平定商团叛乱	(262)
三、兵败赣南	(267)
四、痛失主公	(273)
第八章 坚持既定方针	
一、平叛杨、刘	(279)
二、第二次东征和力促两广统一	(286)
三、中山舰事件与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召开	(293)
第九章 在历史转折时刻	
一、从出师北伐到迁都武汉	(307)
二、从武汉政府的成立到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的召开	(316)
三、从郑州会议到宁汉合流	(328)
第十章 “伴食宰相”告终	
一、配象主席	(339)
二、闲置行政院	(346)
三、去世	(355)
四、结束语	(357)
后记	(362)

第一章 家世和早年生活

一、总督之子

谭延闿，字祖安、组安^①，别号畏三、非庵、韶斋^②，斋名慈卫室、铄冰馆^③。湖南茶陵县人。1879年12月14日（清光绪五年农历十一月初二）^④出生于浙江省会杭州。其时，他的父亲谭钟麟任浙江巡抚。

谭延闿的祖先，自元至正年间由江西永新迁徙至茶陵，“世为农，朴谨有家法”^⑤。曾祖父谭世峻，“敦厚豁达，不苟然诺，以忠信率乡里”^⑥。祖父谭之恒，为国子监生，“能文有懿行，教授湘潭，学者称九涛先生。”^⑦他有4个儿子：鑫麟、锡麟、钟麟、镇麟。老一、老二、老四先后夭折，独老三钟麟活的时间最长。

① 据说谭延闿降生时，他的父亲梦见何凌汉衣冠来拜，遂惊起，适值夫人生下一男孩，故取字为祖安。何凌汉，字云门，湖南道县人，嘉庆进士，道光年间官至户部尚书，卒追赠太保，谥文公。

② 著有《非庵诗草》、《韶斋诗草》。

③ 著有《慈卫室诗草》；信札中曾署铄冰馆。

④ 关于谭延闿出生年月，有的著作误记为1876年，兹据《茶陵谭公年谱》订正。

⑤ ⑥⑦据谭伯羽编《茶陵谭公年谱》第31页。

谭钟麟（1822—1905），字文卿，少年聪惠过人，“始入塾发问，已屈其师”^①，唯刻苦用工，为塾师所厚爱。然家中并不富裕，“年十六即授徒自给”^②，后又“发奋读书，山寺诵习，常至夜分”^③，每遇艰难困苦，不少退却。历次应考，多向亲友借贷川资，并常“徒步数百里，往返未尝乘船车。”^④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中提学试第一；1846年（清道光二十九年）乡试中举人；1856年（清咸丰六年）会试中式，赐进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历任江南监察御史、杭州知府、河南按察使、陕西布政使、陕西巡抚、浙江巡抚、吏部左侍郎、署工部尚书、闽浙总督、福州将军、两广总督等职。谭钟麟仕途顺畅，官运显赫，且颇有政绩。为人处世、治事作官，均有其自身的个性。

一是为人正直，不少假让。1862年（清同治三年），谭钟麟被清廷派赴湖北担任乡试副考官，湖广总督官文以施南府属在清代无举人中式，主张别出一试卷，援引边郡成例以便利之。众考官均附和官文的意见，独谭钟麟坚持不可更易旧章。他的理由是：“奉命主试，不可更旧章。且安知施南终不举者而苗疆例之持不可。”^⑤是科考试结果，施南籍举人被录取者7人，官文见此无话可说。1864年，皇室恭亲王奕訢受到朝廷严词谴责，罢议政王，下九卿科道议罪，诸亲贵王大臣都主张“先有成劳，宜得免议”，依次请与议者签名。谭钟麟则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朝廷正因为对奕訢有所猜疑，才召集群臣公议，为臣者岂能“首鼠两端”，不负责任，敷衍其事

① 《茶陵谭公年谱》第32页。

② 《茶陵谭公年谱》第32页。

③ 《茶陵谭公年谱》第32页。

④ 《茶陵谭公年谱》第32页。

⑤ 《茶陵谭公年谱》第33页。

呢？即上疏陈述己见：奕訢在皇上召见之时，语言不检，自当斥责其过，但现今内忧外患同时并至，尤为需要“上下一心，共资康济”，如果朝廷内部“先启猜嫌”，则“根本之地，未能和协，骇中外之观听，增宵旰之忧劳”^①，于封建统治实有害而无益。同治帝和慈禧太后览奏如梦方醒，仍重用奕訢为军机大臣。

二是不畏强暴。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虽于1864年被残酷镇压下去，但由于多年战争，江浙一带民力日衰，生活异常艰难。谭钟麟在杭州知府任内悉心恤流亡，理狱讼，清赋税。豪强徐正魁、张桂林等横行乡里，擅杀良民，强占民妇，无恶不作，谭钟麟坚主绳之以法。有人劝其三思而行，以徐正魁等党羽甚众，恐急生变，致无法维持局势。谭钟麟不从，终将徐氏等人置之于法，颇得民心。1895年，谭钟麟调任两广总督。广东滨临海外，与各国通商最早，故中外交涉之事多于他省。谭氏到任后，抱定“非条约明许，不肯丝毫迁就，虽恫喝无所让”^②的基本对外方针，尽力维护民族利权。此时，英国欲筑九龙至广州铁路，法国欲索合浦县矿权，谭氏“皆力拒绝”^③。1898年，英国强租九龙，法国强租广州湾，清廷允与定约。谭钟麟闻之，电奏表示反对：“言其形势关系，不可轻许。”^④其议未得清廷允可，故大叹“国势不振极矣。”^⑤继则权衡利弊多寡，主张两害相形应取其轻，即“英于九龙，势已固，宜舍勿争”，但应“专力待法”^⑥。“专力待法”的理由是，法国强租广州湾，其所索几尽吴川、遂溪两县境，且及东海、欽州二岛。谭钟麟从维护中华民族利权出发坚持不

① 转引自《茶陵谭公年谱》第35页。

② 转引自《茶陵谭公年谱》第54页。

③ 转引自《茶陵谭公年谱》第54—55页。

④ ⑤⑥转引自《茶陵谭公年谱》第55、55、55页。

允，两相僵持一年多时间。吴川县民组织团练以拒法军的入侵。谭钟麟遣其所部 5000 人配合作战。1899 年秋，清政府派广西提督苏元春至广州湾与法国议界，谭钟麟向苏提出可与不可许诸条，主张“据理力争”，但苏元春在与法国代表开议之时，悉遵法意愿，订立《广州湾租界条约》，同意租让广州等地给法国，并允准两广、云南为法国的势力范围，谭钟麟闻讯后上疏抗之，坚请废约。当广东遂溪人民抵抗法国侵略军，并给予沉重打击，法国公使向清政府提出严厉镇压遂溪人民和立斩遂溪知县的无理要求时，谭钟麟电陈自负其事，声称此事与知县等无关，并申斥法军枪杀百姓的罪行，要求清廷向法国索取赔偿金。然而，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竟对外步步退让，满足了法国强租广州湾等无理要求。谭钟麟对此极为不满，甚感“为国家守土不能保，又重伤吾民，何颜复居此乎！”^①乃多次上奏清廷，要求立即解任。

三是重封建的仁义礼信。自 1899 年中法《广州湾租界条约》订立之后，谭钟麟知国事已不可为，乃称病奏请辞职，先后达 5 次之多。清廷不得已赏假两个月养病，并令赴京陛见。谭钟麟自 1901 年春入京后，又请开缺回籍养病。此时，义和团运动蓬勃兴起，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太后等仓惶逃往西安，各王公大臣亦纷纷避逃他往，谭钟麟则不愿离去。他认为，虽然形势至此，守居北京无益，但作为一个大臣，目睹京都不保，国事危殆，有何面目忍先弃离？这可说明谭钟麟对清廷的忠与义。谭钟麟有一个昔日的朋友刘某死于北京，他主其表安葬刘某于家乡。福州将军死，妇寡子幼，欠公私之债逾万，谭钟麟从自己的俸禄中按月代为偿还。诸如将吏有劳绩，死无以归者，必赠厚金，存养其妻与子之事例者，先

^① 转引自《茶陵谭公年谱》第 56 页。

后不下 10 余起。

此外，如在陕西巡抚任内兴义学，立书局，浚郑白渠，教民种桑养蚕，纺纱织布；在陕甘总督任内立官车局，罢苛捐浮税；在两广总督任内整饬吏治，严禁赌博。他在历任之内，力求节省公帑，整理财政，省民疾苦，诛锄豪强，积储仓谷，以备灾荒，在贫瘠之区政声尤佳。

从上述诸多事例可以看出，谭钟麟的思想和言行，反映了湖湘文化中的实学和理学并重的精神，即为学治事以躬行实践为主，持己则严而与人忠笃不贰。这种言行身教对于谭延闿的处世为人，治事服官，自青少年时期就自然发生了一定的影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谭延闿的母亲李氏，是河北省宛平县人，早年父母双亡，与其弟相依为命。1871 年谭钟麟奉命赴任陕西布政使，以其元配陈氏患病，不能随至任所为由，闻李氏明达贤慧而纳聘之。1892 年，谭钟麟赴任闽浙总督，举家南奔，道出长辛店，李氏便道拜谒先人之墓，并与其弟李安清相随南行。谭延闿始得与舅父相认，并知外祖家为长辛店人。他在《儿时杂忆诗》中说：“相逢姊弟恨无家，雪涕亲斟饭后茶；说与痴儿知外氏，长辛店北路三叉。”^① 母亲李氏早年的孤儿生活以及嫁至谭家为小老婆的艰难处境，对谭延闿一生的生活情趣无疑留下了一定的痕迹，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母李氏常对他们兄弟说：“读书所以学为人也，徒猎取富贵功名何益？吾望汝曹为好人，不望汝曹得好官也。”^② 的确，谭延闿对其母非常孝敬，不敢有半点违拗之举。诸如发奋读书、赞助新式教育、出任湖南军政府都督、变卖家产支助孙中山等义举，均

① 《慈卫室诗草》第 62 页。

② 《茶陵谭公年谱》第 88 页。

与他的母亲许可和促成有关。更有一事值得一提：谭延闿 40 岁时，夫人方氏去世，之后他一直未续娶继室，这一家风延续至他的子孙辈未尝更改。据说，谭氏在广州陆海军大元帅府担任要职其间，孙中山曾亲自作媒，欲以宋美龄续配于他。谭延闿托以母亲李太夫人嫁到其家后，受过许多难言之苦，况且他对其已故的方夫人感情专一，不再有续弦的打算为由，婉言谢绝了孙中山的好意。后来，谭延闿拜宋美龄的母亲宋老太太为干娘，与宋美龄兄妹相称。蒋介石欲娶宋美龄为妻，遭到宋家诸人的反对，宋美龄曾求助于谭延闿这位“畏三哥”做过她家里人的说服工作。

谭延闿虽然出生于浙江省会杭州，但他的老家却在湖南东部的茶陵。他曾先后多次回过茶陵，并在青少年时期于家乡间度过一段终身难以忘怀的生活。因此，有关青少年时期谭延闿的思想和言行受其家乡社会风尚、文化传统的影响问题，在此有必要阐述一下。因为，山川与历史人物，对于后人为学做人以及进德立业，均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茶陵县位居湖南东部，北界攸县，西邻安仁，南接酃县，东连江西省莲花、永新、宁冈等县。汉始置县，属长沙国。三国时属吴之湘东郡，晋以后袭其旧。隋时，属湘潭县（笔者按：非今湘潭县），公元 698 年，复置茶陵郡，属衡州治辖。五代及宋初因之，至公元 1139 年升为茶陵军，仍属衡州治辖。元初军废，复为县。公元 1282 年升为州，属湖广行省治辖。明初降为县，成化中复为州，属长沙府治辖，清代沿其旧^①。茶陵历史悠久，经济虽不发达，但文化却源远流长，出了不少饱学之士和显赫之官。明代宰相李东阳，字西淮，为茶陵陇下人。明天顺年间进士，孝宗时，官至大学士，“立朝 50 年，

① 参见《湖南省志》第 2 卷，《地理志》上册。

清节不渝”^①，文章典雅，为世所宗，系茶陵诗派领袖，曾领袖明初文坛 40 年。著有《怀麓堂集》，是一个有名的历史人物。清初彭维新，系茶陵石阡人，学者称之为石阡先生。历官康熙、乾隆、雍正三朝，曾任户部、礼部、吏部、刑部侍郎，刑、户两部尚书。此外，还有张治、刘三吾、萧锦忠、谭钟麟、尹铭绶等著名学者和官僚。茶陵自李东阳以文章相业，蔚为一代盟主后，彭维新等继其后，较为重视中华传统文化以及乡邦先哲德行情谊的传递，至清中后期办起了一些著名的书院，哺育了不少封建的“英毅之才”。谭延闿从小跟随其父问学做人，受业于当时名师，其中有些是湖湘文化名人。他受这种文化环境的熏染陶冶，在名师指点下锐意功名，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条传统的封建士大夫人生模式迈出了一步又一步。

总之，谭延闿生长在官宦之家，作为一个权势显赫的总督之子，优裕的生活条件和较为浓厚的文化传统环境，为他创造了锐意功名的良好路途；同时由于他的父亲处世为人的方法和态度，以及母亲的诸多遭遇，又使他从小在无形之中受其影响，因而对世事人情看得比较透彻。

二、科举成名

谭延闿的青少年时代，过的是一种转徙南北的生活，走的是一条科举成名的道路。这种生活，这种道路，对他终生处世为人、服官治事既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也决定着他的基本人生志趣和归宿。

由于谭钟麟自 1881 从浙江巡抚调任陕甘总督，至 1888 年以目疾乞假而离职止，先后在陕甘任职达 7 年之久，所以

^① 《明史·李东阳传》。

谭延闿的儿时生活基本上是在兰州度过的。他7岁开始读书，其启蒙老师为兰州张宝斋。张是一位长于文字学的老师。谭延闿在《儿时杂忆诗》中说：“霜鬓庞眉一尺须，万言撑腹注虫鱼；熏笼围坐听闲话，更乞先生为甚酥。”^①由此可知，这张老先生是位长须庞眉而好谈古今趣事的饱学之士。1889年，谭延闿随父至西安，受教于姚世贞。不久，举家抵达长沙，居荷花池私宅，受业于李少苏。次年，又从陈春坞学。谭延闿少年聪惠过人，11岁时即学作制艺文字。这除了历任先生的严格执教之外，还与他的父亲精心辅教有关。据谭氏回忆说：“丁亥先公方以目疾乞假，每上灯，独坐签押房，使人读公事文牒毕，呼余及亡姊亡弟共坐室隅，各作破题一，或试帖二句，间日互易，皆先公口授。……有时不知书写，则先兄从旁代书之。复诵无讹，则各与钱十文，乃起就睡。”^②由此而知，谭钟麟对谭延闿等人督课特勤，且常示鼓励。1891年，清政府任命谭钟麟为吏部侍郎，时年70岁。其好友翁同龢与谭钟麟在京。故旧重逢，喜不自禁，遂于谭钟麟70大寿那天书赠一联以贺之。这年夏，谭延闿偕其母至京。翁同龢等因常往谭府叙旧，谭钟麟则把谭延闿所写习作作友朋传阅。谭延闿自记当时课题中说：“此数文最为先公所赏，常示友朋。翁文恭、徐颂师皆尝来索看，吾亦常拜翁丈于厅事”^③。翁同龢在日记中也曾记及此事，称许谭延闿为“奇才”。这时谭延闿仅12岁。

1892年6月，谭钟麟赴任闽浙总督，谭延闿随行至福州。是年7月，回长沙应童子试，入府学为附生。试毕返福州，从陈春坞、姜竹轩受教。在这期间，谭延闿从陈春坞受教的时

① 《慈卫室诗草》第62页。

② ③转引自《茶陵谭公年谱》第9—10、15页。

间最长，受其学识影响亦较深。他在题癸丑日记后作诗说：“篝灯写记记吾师，绝似长安夜学时，惭愧雕虫亦无技，卅年赢得鬓成丝。”^① 1893年，清廷下诏举办恩科乡试，谭延闿回长沙应试，试毕返福州，转从陈季原为师。次年8月，又自福州回湘应乡试，拜谭铭三为师，致力于宋儒之学。谭铭三与曾国藩为至交，同主程朱，推崇主敬存诚之学。曾氏以团练起家，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为延长满清60余年的寿命立下汗马功劳，成为“中兴名臣”。而谭铭三以作育英才自任，曾以主敬存诚之学教授谭钟麟。此时，谭铭三做学问已达炉火纯青之境界，故谭延闿虽从其学时间不长，但受益非浅。1895年，谭钟麟调任两广总督，谭延闿随居广州读书。1897年，回湘应试优贡，以第2名高第入榜，旋返广州从丁伯厚受课时艺。丁时以翰林院编修在籍主考粤秀书院。谭延闿受其业，每三、八两日作文一篇，学业日有长进。他在《己巳夏自记课艺后》说：“丁先生谨身慎行，躬行实践，下笔不苟，勤勤不稍假让。今日读此，犹见循循诱导之衷，至为可感。”^② 1899年，谭钟麟乞假南归，住长沙荷花池私宅，谭延闿即随返湘，受教于主讲长沙城南书院的刘采九先生。1902年，谭延闿应乡试，中式第99名举人。1904年，赴开封应会试，以第一名入选。此即所谓会元，为湖南200多年来的第一个会元。父子同荣学苑，一时传为佳话。是年5月，谭延闿入京应殿试，以二甲第35名赐进士出身，朝考一等第1名，遂为翰林院庶吉士。7月到职，不久告假南归。

谭延闿生长于书香门第，簪缨世家，没有堕入一般浪荡公子之列，而是按照中国传统的人生模式——“修身、齐家、

① 转引自《茶陵谭公年谱》第15页。

② 转引自《茶陵谭公年谱》第22页。

治国、平天下”的道路朝前迈进，在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之下，终于爬上了科举仕途的最高阶梯。然而，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

第一次鸦片战争引起了中国社会的转折，正如马克思指出：“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①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空前的冲击，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激烈，交相出现。虽然，清朝统治者一方面倾全力残酷镇压太平天国、捻军等人民起义，另一方面尽力讨好帝国主义列强，与之签订一个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将中国推向了半殖民地化的深渊。然而，要求进步、要求改革的呼声，在一切爱国志士仁人的倡导和推动下一浪高过一浪，挽救民族危亡成为了时代的中心主题。就在谭延闿出生前后，即19世纪70—80年代，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的政治观和改革思想日益深入社会，到了19世纪末年，终于引发了一场旨在救亡图存的戊戌维新运动。同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也脱颖而出。两者构成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的热潮。就当时思想发展水平而言，维新思想和维新运动体现了这一时代激变的主流，显示着时代发展的新内容和新趋向。它要求贯彻君主立宪的政治和经济主张、大力提倡兴办学校、改革教学内容、废止某些封建陋习，以及实行其他广泛的资产阶级改革的具体措施，把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谋求国家独立、民主和富强的斗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维新派在思想界掀起的革新狂飙，有力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教育和启迪了一代新人。谭延闿虽在当时正致力于猎取功名，无暇过问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页。